

清代官德丛谈

李文海 著

历史
回眸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清代官德丛谈

李文海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历史
回眸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代官德丛谈/李文海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7
(历史回眸)
ISBN 978-7-300-16095-5

I. ①清… II. ①李… III. ①干部—道德修养—中国—清代—文集
IV. ①D691.4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46676 号

历史回眸

清代官德丛谈

李文海 著

Qingdai Guande Congt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48mm×210mm 32 开本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张 5.5 插页 3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11 000 定 价 19.5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自序

从2008年开始，我在《光明日报·史学》陆续发表了一组读书札记，一共9篇，题为《清代政治文明杂谈》。由于写的时候并非一气呵成，而是断断续续，得空便写一点，所以全部刊发完，前后竟经过了两年多时间。有朋友建议，如果把这些短文集中起来，也许能给愿意翻翻的读者提供一点方便。随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同志也表示了同样的想法。我便将这几年写的主题大体相近的文章收集了一下，编成这本小册子。因为文章内容主要是讲政治伦理，也就是现在通称的“官德”，所以书名就叫做《清代官德丛谈》。

这些文章都很短，每篇大都两千多字，花不了十分钟就可以读完一篇。这当然是为了适应报刊的需要，但也正是我所努力追求的。

少写长文，多写短文，是我进入古稀之年后的一个心愿。

所以有这个想法，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自己年岁渐长，精力渐衰，研究宏大主题，创作鸿篇巨著，难免会有力不从心之感。纪晓岚在谈到为什么写《阅微草堂笔记》时，讲了这么一

段话：“景薄桑榆，精神日减，无复著书之志，惟时作杂记，聊以消闲。”纪晓岚开始写《阅微草堂笔记》时，不过60多岁，像他这样的学问大家，尚且感到“精神日减，无复著书之志”，何况我辈，自然更应该有自知之明。写点小文章，“聊以消闲”，正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但更主要的却还有另一个原因，是根源于我对如何更好发挥史学社会功能的一点思考。这些年来，历史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出现了一定的繁荣景象。但发展中也存在某些危机，其中之一就是历史研究同社会生活的联系相对薄弱。许多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读者面却十分窄小，通常局限在少数同行专家之间。广大群众接受历史知识的主要渠道，往往是一些历史题材的影视故事或文艺作品，这些作品本来就不是以传播历史知识为职志，有的甚至公开申明是在“消费历史”或“戏说历史”，但人们偏偏误认为所讲的就是历史的真实。这种情况引起了一些人的忧虑。但我们不能禁止人家写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而必要的虚构又正是文艺作品同史学著作的本质区别之一。所以，倒是我们史学工作者自己，需要改变某些传统习惯，更加努力地写一些能够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喜爱的东西。十几年前，我曾发表过一篇短文，题目叫做《历史学，请走出史学界》，其中说：“史学工作者的作品中，很少有以史学界以外的广大群众为读者对象的。史学研究的成果通常只是作为史学界一部分同仁交换研究心得的手段。”这当然十分必要，但却远远不够。“史学家还要善于跨越史学界，关注社会，关注群众，重视对全社会提供对于当前社会生活有借鉴意义的直接或间接的历史认知。”“任何一门科学，哪怕是最深奥的学问，

如果不同丰富鲜活的社会生活发生紧密的联系，不同广大群众发生密切的关联，就不可能有生命力。”我努力去学习写一些随笔、小品之类的杂文，就是实践上述想法的一个具体行动。

不过在史学界这个圈子里待久了，要走出去却并不容易，步履蹒跚地走几步，实在也走不多远。但情况还是有了一些变化。短文发表了几篇后，颇有一些熟识的和不太熟识的、搞历史的和并不搞历史的朋友，表示读过或关注过这些文字，有的甚至还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这在过去发表学术性论文中是很少遇到的。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去年6月的一天，在一次会议上，令狐安同志递给我他写的一首诗。这首诗已经发表在2011年第11期的《中华魂》上，这里照录如下：

读李文海杂文有感

二〇一〇年三月

仇谤喜谀谁报忱，空文崇尚未知羞。

巧言令色为亲信，逆耳犯颜若寇仇。

钓誉沽名何日止，弄虚作假几时休。

渐习渐惯愁难改，如此怎当孺子牛。

令狐安同志是一位很有正义感的诗人。他在繁重的党政领导工作之余，写了不少充溢家国情怀、关心百姓生活的诗。如他写的《愤闻某地卖官成风有感》、《讽某地政绩造假》、《斥贪官污吏》、《武松无奈大虫何》、《忧某市被征地农民二首》等诗作，痛快淋漓地无情鞭挞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情深意切地表达了对普通劳动群众的关切和热爱。在上面那首诗中，他从历史现象中联想到社会现实，凸显了历史同现

实的紧密联系。我一向认为，历史离今天、离我们并不遥远，历史虽然过去了几十、几百、几千年，时代和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有一些历史规律、有一些历史经验、有一些历史真理，仍然同我们今天的生活十分贴近，至今并没有失去其生命力。南宋诗人陈渊有诗云：“谁云古人远？正是无来去！”今天的人们可以从古人那里得到许多历史的智慧，从过去发生的事情中得到生动的历史借鉴，这正是史学的魅力所在。

今年恰好是统治了中国 268 年的清王朝覆亡的一百周年。一百年前，革命的人民推翻了已经成为社会发展障碍的清王朝，但历史并未因此就截然割断，一个新的时代仍然要在旧基地上逐渐成长。新旧之间，依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前辈曾经的辉煌，用发展的要求去努力挣脱先人留下的因袭的重担，这应该是史学工作者的一个神圣的职责。收在这本小册子里的一些短文，算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一点痕迹。

毛泽东同志说：“读历史是智慧的事。”（《致蔡和森等》，见《巨人的性格——毛泽东的书信》，5 页，北京，地震出版社，1992）如果通过这本小册子，能够从历史中汲取一些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那就是“聊以消闲”之余的意外收获了。

2012 年 3 月 31 日

于世纪城时雨园

目 录

为政以爱民为本	
——清代政治文明杂谈之一	1
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	
——清代政治文明杂谈之二	6
俭以成廉 侈以成贪	
——清代政治文明杂谈之三	11
大臣不廉 小臣必污	
——清代政治文明杂谈之四	16
为政以通下情为急	
——清代政治文明杂谈之五	21
切戒“悦谀成风”	
——清代政治文明杂谈之六	26
疲是居官大病	
——清代政治文明杂谈之七	31
信者居官立事之本	
——清代政治文明杂谈之八	36
不专一己之见	
——清代政治文明杂谈之九	41

风气关乎治乱	46
清代官场迎送何以成灾	50
变了味儿的“人际交往”	55
清代积案之弊	60
官员尸位与胥吏擅权	66
侈靡与贪黷	71
吃的品位	76
话说贪官“倡廉”	80
顺治帝“下诏求言”为什么失败？	85
顺治帝论为官四戒	90
总督张悬锡的自杀风波	95
康熙帝八拒尊号	99
一场地震引发的政治反思	104
读孙嘉淦《预防三习疏》随想	108
惨绝人寰的突发灾难	
——光绪三年天津粥厂大火纪实	112
劝善与募赈	119
“老屋子”的比喻	123
清代社会如何看待“官宦子弟”？	128
养生与修身的统一	
——清人家训中的“致寿之道”	135
清朝的“白发卿相”现象	141
一个朝代的终结和一个时代的终结	148
清朝统治者的自救努力为何未能挽救灭亡？	153
清王朝与“兴亡周期率”	158
清朝历史地位的总体评价	163

为政以爱民为本^{*}

——清代政治文明杂谈之一

封建政治充斥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与对抗。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种“政治权力”早已独立于社会之外，“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为社会的主人”（《反杜林论》）。所以，它不可能成为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套用一句我国先哲的话，“官视民为草芥，民视官为寇讎”，则是封建官民关系的常态。

但问题还有另外一面。作为传统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内容，统治者常常宣扬“重民”思想，提倡关注民生，关心民瘼，强调“为政以爱民为本”。这种观念在清代得到广泛的传播。康熙皇帝在上谕中就多次提到：“朕事事以百姓为念”，要求各级官吏要“念切民依”，“必使家给人足，安生乐业，方可称太平之治”；“但操守廉洁，念念从爱百姓起见，便为良吏”（《康熙政要》，卷1、卷9）。

^{*} 本文发表于《光明日报》，2008-09-21。

这种看似矛盾的历史现象，其实也并不难理解。一方面，任何一个略有头脑的统治者，大抵都能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知道“天下之治乱系乎民”。另一方面，“民本”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着巨大的影响，从《尚书》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清初王夫之的“君以民为基”、“无民而君不立”等等，这些思想一脉相承，在封建时代一直同“尊君”观念并行而不绝。这不能不在政治文明中得到强烈的反映。

在清代名目繁多的“官箴”类著作中，宣扬“国家根本在百姓”、“为官一方，必为民出力”的内容，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其中，包含着相当丰富的思想内涵，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曰“爱民”。有的书中把“爱民”提到治国理政的根本出发点的高度，所谓“朝廷设官，原以为民。官必爱民，乃为尽职”（徐栋、丁日昌：《牧令书辑要》）。只有从爱民出发，才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常怀一点爱民之心，时时刻刻皆此念充满于中，自然事事为百姓算计，有一民不被其泽，便如己溺己饥，安得无不忍人之政？”（《朱舜水集·问答三》）有了爱民之心，便能实心任事，勤于政务，不因一己的利弊得失而顾盼彷徨。金庸斋《居官必览》称：“充我恳恻爱民之心，盎然天地之初意，氤氲氤氲，盈满于胸中，发而施之于政事。凡世俗之毁誉利害，休戚得失，一毫勿使芥蒂于心，以杂我正念。”（乔立君主编：《官箴》，396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相反，如果为官者缺乏爱民之心，只知谋一己之私，则不但会

祸害百姓，残民以逞，而且会动摇政治统治的基础。同书尖锐地指出：“乃居官牧民者，逞志作威，严刑聚敛，贱民如粪土，疾民如仇讎。非但我之一身，罪孽山积，独不为国家根本之计乎？”（乔立君主编：《官箴》，462页）

二曰“利民”。不但要“存爱民之心”，更重要的是要“行爱民之政”，也就是要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为民谋利，造福百姓。“利民”的要义是一切政治举措，要时刻注意为百姓兴利除弊：“膺民社者，不必广求施济，但询其利害所在，害民之事，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利民之事，早兴一日，则民多一日之安。”（觉罗乌尔通阿：《居官日省录》，卷2）前引《居官必览》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为民牧，一方生灵，皆系于我，庶几夙夜焦劳，靡解厥职。民之所乐，我则遂之；民之所苦，我则除之。纵不能智虑毕周，跻斯民于衽席，然我为官一日，自当尽一日之责。”（同上书，397页）有的提出“官必好恶同民”的主张，“凡百姓所利，官亦曰利”；“百姓所苦，官亦曰苦”（袁守定：《图民录》，卷4）。也有的说，“事关民生”，应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蒋士铨：《官戒诗》）。官员们以百姓之苦乐为苦乐，以百姓之是非为是非，虽然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和利益冲突的客观存在，真正实行决非易事，但能够提出这样的命题，并且作为政治道德与行政良知的追求目标，显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思想意义。

三曰“亲民”。在封建政治下，官民之间尊卑悬绝，等级森严。官吏们常常“倚势作威，俨以官府自尊，驱民如羊，纵隶如虎”；而百姓们“见里长则面色青黄，望公门则心胆战

惊”。这种情况，就造成了“上下之情不通”。《图民录》强调：“凡上下之情，通则治，不通则不治。”“如官有所行，不能达所行之意于民；民有所诉，不能面达所诉之情于官，此上下不通也，不治也。”（卷3）因为只有官员们“平易近民”，“而后民得以尽其情，上得民情，而后可言治理也”（卷1）。在这里，居官者能否去上下之隔阂，忘一己之威仪，真正做一个亲民之官，是能否实现政通人和的关键。汪祖辉《学治臆说》认为：“治以亲民为要”，“亲民之道，全在体恤民隐，惜民之力，节民之财，遇之以诚，示之以信。不觉官之可畏，而觉官之可感，斯有官民一体之象矣。民有求于官，官无不应；官有劳于民，民无不承”（卷上）。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放下架子，走出衙门，轻车简从，体察民情。《居官必览》批评了官场流行的“迎送欲远，称号欲尊，拜跪欲恭，供具欲丽，酒食欲丰，驺从欲都，伺候欲谨”，以至“行部所至，万人负累，千家愁苦”的恶习，勾勒了下面这样一种“亲民之官”的生动形象：“时屏驺从，巡历乡村，与山农野叟，欢然讲论，察访舆情。不烦人迎接，不累人一啜一杯，务期民志常通，欲恶与共。”（乔立君编：《官箴》，342、354页）

四曰“畏民”。这里所说的“畏民”，不是指畏惧百姓，更不是说有关民生之事，一味畏葸不前，而是指对老百姓要时刻存有敬畏之心。晚清思想家王韬曾说：“勿以民为弱，民盖至弱而不可犯也；勿以民为贱，民盖至贱而不可虐者也；勿以民为愚，民盖至愚而不可欺也。”（《弢园文录外编·重民》）只有对百姓心存敬畏，居官者才“不敢肆于民上，为所欲为”，也

才能真正达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的境地。（方大湜：《平平言》）《图民录》对这个问题说得更透彻一些：“居官临民，以敬为本。”“敬则百姓受无穷之福，不敬则百姓受无穷之祸。凡贪婪暴虐，毒腐百姓，何一不从不敬生来？”（卷1）强调“畏民”，其出发点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他们深深懂得，“民悦则久安长治”。有的书把“官不畏民”叫做“乱阶”，意思是说，一旦官员失去了对百姓的敬畏，就必然无所顾忌，胆大妄为，贪得无厌，民不聊生。那样，社会的动荡也就到来了。

上面所说的“爱民”、“利民”、“亲民”、“畏民”，都是在封建意识形态的范围之内的观念，都是在封建统治秩序条件下的认知。他们的最高信条，不过是“为民作主”，做到“愚者觉之，弱者扶之，屈者申之，危者援之，缺者完之，隐然为一方保障，使一方之人，皆有所恃以无恐”（袁守定：《图民录》，卷1）。也就是替百姓当好主人，这与我们今天所要求的“民主”当然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无视甚至抹杀其珍贵历史遗产的思想价值，这些思想内容，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没有失去现实的历史借鉴意义。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封建制度是坏的，但统治阶级中也不是一无好人，尽管他们对人民的同情是有局限性的，但是那时的人民对这些人还是歌颂的。”（《周恩来选集》，下卷，1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

——清代政治文明杂谈之二

大约从西晋时起，官场中就流传着“清、慎、勤”是“居官三字诀”的说法。清代的康熙皇帝曾亲笔书写此三字赐给大臣，以为倡导。清人在解读这三个字时，普遍认为“清者，大节”，“三字之中自以清为第一义”。这里所说的“清”，就是指清正廉洁。

清廉的另一极是贪黷。在现实生活中，一则由于封建政权的性质与人民群众相对立，二则由于政治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三则由于政治运作机制上存在着种种弊端，封建官员中贪黷行为极为普遍，贪赃枉法现象比比皆是。正像有的书中所说：“求一真正清廉之吏，几等于麟角凤毛。虽在上者日言惩贪，而实有不能苛求之势。”（徐世昌：《将吏法言》）这种状况，大大加重了民众的苦难，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政局的动荡。

^{*} 本文发表于《光明日报》，2008-11-23，《党风廉政建设》2009年第7期转载。

因此，一些较有作为的统治者，总要努力设法倡廉肃贪，整饬吏治，以稳定统治秩序，巩固统治权力。拿前面提到的康熙皇帝来说，就曾在谕旨中多次强调“官以清廉为本”，“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廉洁者，奖一以劝众；贪婪者，惩一以儆百”（《康熙政要》，卷15）。他在亲撰的《廉静论》中坦率地说：正因为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严重的贪黷现象，就更应该大力提倡清廉。“自为吏者有贪私之实，而后重廉洁之名，故尤以廉为贵。”“吏苟廉矣，则奉法以利民，不枉法以侵民；守官以勤民，不败官以残民。民安而吏称其职也，吏称其职，而天下治矣，故吏尤以廉为贵也。”（同上书，卷13）

为什么把清廉作为为官的根本，把惩贪奖廉作为治天下的要务？主要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官员的贪黷行为危害极大。清代各色“官箴”类著作，对此有着十分详尽深入的论述和揭示。

从自身修养的角度讲，大凡官员一涉贪贿，整个人的品德人格就会全线崩塌，变得猥琐污浊，再也无一丝正气可言。“人只一念贪私，便销刚为柔，塞知为昏，变恩为惨，染洁为污，坏了一生人品，故古人以不贪为宝。”（彭忠德、李正容编：《居官警语》，195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从断案执法的角度讲，贪赃必定枉法，一旦贿赂公行，就决不可能再有公正、公平之存在。对贪官们来说，“生死曲直，不断之以法，而断之以赂”；只要利之所在，就可以“曲直倒置，生死任意”（陈宏谋：《在官法戒录》，卷1）。这样，必然是横暴者肆无忌惮，受害者告诉无门，冤抑遍地，公理荡然。